

国学大讲堂

【韩愈文集导读】



钱伯城 著

韩愈文集导读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韩愈文集导读】

国学大讲堂

钱伯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文集导读 / 钱伯城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3003-3

I. 韩... II. 钱... III. 韩愈(768~824) - 古典散文 - 文学欣赏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035号

韩愈文集导读

著者	钱伯城
责任编辑	姚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55千字
印 张	18.2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03-3 / I · 258
定 价	3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1月

目 录

导 言	1
赋	35
感二鸟赋并序	35
杂 著	40
争臣论	40
画记	47
原道	53
原性	65
原毁	69
原人	75
原鬼	77
师说	79
送穷文	84
进学解	89
讳辩	98
伯夷颂	102
子产不毁乡校颂	106

蓝田县丞厅壁记	109
杂说四首	113
读荀	120
读仪礼	122
读墨子	124
鳄鱼文	127
传 记	132
太学生何蕃传	132
张中丞传后叙	137
圻者王承福传	145
毛颖传	151
书 启	159
上宰相书	159
后十九日复上书	167
后廿九日复上书	170
与孟东野书	174
答李翊书	176
与冯宿论文书	181
与崔群书	184
答吕巽山人书	189
赠 序	193
送李愿归盘谷序	193
送孟东野序	197
送董邵南序	204

送高闲上人序	206
祭文 哀辞	211
祭田横墓文	211
欧阳生哀辞	213
题哀辞后	215
祭十二郎文	220
吊武侍御所画佛文	225
碑 志	229
贞曜先生墓志铭	229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235
柳子厚墓志铭	241
柳州罗池庙碑	249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254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258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262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266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270
表 状	275
论佛骨表	275

导 言

一、韩愈的生平

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期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昌黎（今辽宁义县）是其郡望，故常自称“昌黎韩愈”，后人便称他韩昌黎。他最后的官职是吏部侍郎，后世又称他韩吏部。死后谥“文”，所以又叫他韩文公。

韩愈出生的时候，唐王朝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朝政腐败，走向下坡。天宝十四载（755），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导致了中央政权的削弱和社会的动荡。安史之乱在代宗宝应二年（763）结束，那是韩愈出生的前五年。然而，战乱结束仅是形式，自后即进入了史书所说的“藩镇之乱”，亦即地方割据时期，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百姓热切希望全国统一安定，忧国的人士也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重树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这种希望，成了后来韩愈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韩愈出身于宦宦之家。祖父韩睿素，做过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

韩仲卿，曾做过潞州铜鞮尉，又任武昌县令，能干贤明，使“奸吏束手，豪宗侧目”；也有文学修养，编过曹植文集，与李白、杜甫等交游。韩愈三位叔父，韩少卿、韩绅卿做过县丞、县令等地方官，韩云卿有文名，擅写碑志墓铭，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

仲卿三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最小的就是韩愈。韩介早亡，韩会在永泰、大历年间颇有声誉，写过一篇《文衡》，主张文章的教化作用。韩愈三岁就做了孤儿，由长兄韩会抚养长大。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的时候，韩会因与宰相元载一党，元载被诛，韩会远贬至京师五千里的韶州（今广东韶关）。韩愈跟随兄嫂南迁，经过壮阔的大江和一望无际的洞庭湖，又越过连绵重叠的山岭。这段旅程后来都写在他的《复志赋》里。

他们在韶州住了两年多时间，韩会得病死了。孤儿寡妇举目无亲。长嫂郑夫人，携领孤儿，跋涉山川，护送灵柩，回归故乡。这一连串不幸，韩愈称为“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轲而艰难”（《复志赋》）。但是家庭的苦难，却也磨砺了他的心志，鞭策他自小刻苦用功。“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韩愈传》）他七岁开始读书，每天背诵文章，十三岁就学习写作。“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不论睡觉饮食，很少离开书本，看得倦了，枕书而眠；吃饭时，看书下饭。“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句，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同时，他关心古今的兴亡得失，“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奋斗的目标也很明确：“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县斋有怀》）。他立志要在政治和文学上做一番事业。

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离开韩家在宣城（在今安徽）

的别业，去京师长安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他企盼着到那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京师去实现宏伟的抱负。

应举觅官，提倡古文

一个风尘仆仆的少年，带着简单的行李，行李中仅有一束书，来到了都城长安。寒碜的行装，掩饰不了他脸上的自信和轩昂的气概。“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上云阙，辞家逐秋蓬”（《赠族侄》）。这诗中少年便是韩愈。

但是，来到长安的第二年，韩愈已到了“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的地步。有一次，他拦住北平王马燧的马头，“以故人稚弟”，拜于马前。马燧带他回王府，款待饭食，赠送衣服。随后他又以同样身份谒见咸宁王浑瑊。韩愈大概就是依靠这些豪门贵族的资助，维持这段艰困的生活。为此他写了颂扬马燧的《猫相乳》（府第中的祥瑞）、颂扬浑瑊的《河中府连理木颂》（府署中的祥瑞）作为报答。

从贞元二年（786）至贞元七年（791），韩愈参加了三次进士考试，都告失败。当时人已经用“五十少进士”（五十岁做进士，只算少年高中）来形容考进士的困难。韩愈后来也曾告诉朋友，“何为从进士，此路转岖嵒”（《孟生诗》），这是他亲身尝试后的甘苦之言。

但是这五六年中，他在文学上已经致力于“古文”的写作。从他给宰相贾耽书中所说“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的话，知他写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古文就是散文，是韩愈为区别于称为“时文”的骈文而首先提出的名称。骈文讲究辞藻典故对偶，不仅束缚文体，而且束缚作者的思想感情。自隋文帝时至初唐，已有改革文体的要求。中唐以后，更有一批作家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出来，

摒绝华艳，写散文，他们都是韩愈的先导。但是骈文势力很大，虽有一些作家的努力，也未能扭转文风。

韩愈到长安的时候，开始连他也不得不顺应社会风气，勉强自己，写些这类文章，像他说的，“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与冯宿论文书》）。那时写作古文还得不到社会重视，“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写作古文有如“从于寂寞之道”（同上）。

韩愈到长安的几年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讨论各自对文学和政治的主张。梁肃是他结识的师友之一。《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独孤及早死，不及和韩愈交往；梁肃则是韩愈考中进士的座师。与韩愈同科和次科进士的人中，可以推知他至少结交了李观、欧阳詹、崔群、王涯、冯宿、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人。他们意气相投，共同努力，推动了古文的写作，形成了运动的规模。韩愈是中心人物。

贞元八年（792），礼部侍郎陆贽主持这科考试。他是一位正直贤明的官员，梁肃做主考助手。韩愈是第四次参加考试，由于梁肃的举荐，终于登第。同榜的共有二十三人。这一榜人才很多，被称为“龙虎榜”，其中有几人后来做到宰相。

然而考取进士，并不等于已经取得官位，还要经由吏部的“守选”和考试。韩愈虽然闯过进士关，在吏部的博学宏辞科前又被挡住。他忍受人们的讥笑拒绝，到处寻找做官的门路。他不断向当权的达官贵人投献诗文，希望邀取他们青睐，从他们那里攀上进身的阶梯。可是没有人回报理会。他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仆在京城

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这是十分沉痛的告白，这段痛苦的生活对韩愈来说不是轻易度过的。

进入仕途，成为儒家“卫道士”

唐朝的一些进士，在寻不到门路做官的时候，另一条出路是通过地方长官的荐举，加入幕府，做一个幕僚。韩愈最后也是靠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荐举，方才第一次获得官职，进入仕途。他的职衔是试秘书省校书郎，职务是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贞元十二年（796）秋天的事。韩愈二十九岁。

韩愈在宣武（治所在汴州）的幕府生活并不是十分愉快的。单调的公务，使他“伏门下而默默兮，竟岁年以康娱”，“情怊怅以自失兮，心无归之茫茫”（《复志赋》）。当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巨大冲击。儒家主张积极进取，佛、道则主张消极无为；儒家主张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佛、道则灭绝伦常；儒家主张社会分工从事生产，佛、道则不事生产，由士农工商四民养活他们。这就形成了思想和社会的严重危机。韩愈这时认识了张籍。张籍后来以乐府诗人闻名，这时则是忠诚的儒家信徒。韩愈指点他写作古文。两人共同切磋儒家学说，反对佛教和道教学说。张籍希望韩愈从事著作，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如此“可以化乎天下”。韩愈则推说“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但是张籍的劝告，事实上是发生了效果的，它促使韩愈认识到自己在维护儒学正统、排击异端的斗争中所负的重大责任。他随后不久就写了自称“扶树教道”的一系列论文，鼓吹和宣传儒家的民本思想，建立儒家道统的传授体系，并且以此作为提倡写作古文的思想理论基础。

贞元十五年（799）二月，董晋病死，汴州发生兵乱。韩愈转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仍旧担任推官职务。接纳他的也并不是一个足以满意的环境。他给李翱写信道：“仆于此岂以为大相知乎？累累而行，役役逐队，饥而食，饱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指张建封）心诚有爱于仆也。然所爱于我者少，不知我者犹多。吾岂乐于此乎哉，将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与李翱书》）他又告知崔群：“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与崔群书》）可知他寄人篱下，心情很不舒畅。

贞元十六年（800）的夏天，韩愈终于辞别了张建封，毅然退出了不能使他有所作为的幕府生活。他把家属安置在洛阳，住在一个草树茂密的乡间，“一室之内，有以自娱”（《与孟东野书》），说明他曾利用这段时间读书写作。有时，他一人走很远的山路，去古寺瞻仰壁画；赤足立在山洞里，清冷的泉水流过他的脚胫，山风吹起他的衣襟。他感到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有时，他约朋友侯喜、李景兴、尉迟汾到洛水去钓鱼。他们涉过满是荆棘的河岸，河流中蛤蟆跳跃，鸟儿洗澡；他们垂下钓钩，很久才钓上一条小鱼……

两次去长安等候调选的韩愈，终于在贞元十八年（802）的春天，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的任命。这虽然是一个教职，却是进入中央政权的开始。韩愈急于仕进，不单纯是为了谋求衣食，更重要的是要由仕途实现其用世的抱负。“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与卫中行书》）。

从贞元十二年（796）到贞元十九年（803），也就是从二十九岁到三十六岁，韩愈在仕途上虽然微不足道，但总算找到了上进的阶梯。他在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上的见解日趋成熟，他所写的文章受到人们重视，影响愈来愈大。他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向世人宣示，他要

举起儒家道统和古文两面大旗，成为两者的领袖。

这个时期，他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其中有宣传儒家思想和道统的论文《原道》等五篇（统称“五原”），有提出古文写作的中心内容和具体要求的《答李翱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刘正夫书》、《送孟东野序》等，有表现了高度艺术和思想相结合的优秀古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师说》等。

卷入政治斗争漩涡

唐德宗在位末年，新旧政权行将交替之际，朝廷上逐渐形成一个以东宫侍书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聚集一批新进青年进士，提出一些革新政治（如抑制宦官、反对割据、惩治贪污等）主张。刘禹锡、柳宗元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韩愈不是集团成员，但政治主张相同，并同刘、柳交好。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这年京畿诸县夏旱秋霜，灾情严重，政府减免赋税，但京兆府不执行，造成民间弃子逐妻，拆屋伐树，人民寒馁倒毙。京兆尹李实对德宗却说：“今年虽旱，而谷仍好。”韩愈亲眼目睹惨状，上奏天旱人饥状，要求德宗“特敕京兆府”，停止征发，让老百姓存活下去。奏章最后说自己“受恩思效，有见辄言”，这同他求官的初衷是一致的。

这通奏状，触犯了深受皇帝宠信的李实，因此德宗下诏将韩愈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连阳）县令。按规定奏章只有皇帝和宰相看到，肯定有人泄漏给李实，使他得以进谗。韩愈怀疑刘禹锡、柳宗元走漏风声。由此他同王叔文集团公开决裂。应该说明，韩愈与王叔文集团闹翻，只是集团与非集团的矛盾，不是政见的分歧。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手段有所不同。后来的评论者，将

王叔文集团列为进步一方，反对王叔文集团的列为保守以至反动一方，把韩愈也归入了后一方，是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韩愈描写他所见到的阳山，“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送区册序》），完全是一蛮荒之地。据史传记载，韩愈“政有惠在下”，民生子，多以其姓为名。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具体的政绩，但可想见他 与阳山人民相处融洽。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死，顺宗继位。连州得到新皇帝嗣位消息，州衙前响起了咚咚的大鼓，表示祝贺。朝廷大赦诏书，用快马传递到全国各地。韩愈得到宽赦，至郴州待命；秋天，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至衡阳途中，得顺宗因病退位、宪宗即位消息。王叔文集团失败，朝廷政局剧变，使韩愈日怀召回长安的希望。元和元年（806）夏天，他终于诏拜国子监博士，回到长安。京师的官场，是是非之地，“器器之徒，相訾百倍”（《答冯宿书》）。一年之后，他自动请求分司东都。“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送侯参谋赴河中幕》），这是他在洛阳的生活写照。元和四年（809），改都官员外郎兼领祠部守东都省，曾裁抑中官。五年（810），改河南县令，曾撻禁藩邸。凡此都证明他有能吏之才。洛阳期间，在他周围聚集起一批朋友，有樊宗师、卢仝、温造、李渤、皇甫湜、贾岛等人，他们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韩愈是他们的领袖。

宪宗号称中兴英主，他二十九岁即位，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他不受宦官挟制，进用一批干练的文臣武将，削平叛乱，从对藩镇的妥协退让，一变而为坚决进取。大家都向宪宗欢呼。韩愈在元和二年（807）就写出了赞美宪宗的《元和圣德诗》，加入欢呼的行列。稍后他又写了《石鼓歌》，借周宣王的中兴颂扬宪宗的事业。

元和六年（811），韩愈召回京师，任尚书职方员外郎，此后官职

屡有迁调，升降不一，历任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年（815），他作为宰相裴度的副手，积极参加了宪宗中兴事业中有名的“淮西之役”，到十二年（817）胜利后，得到了刑部侍郎的职位，这是政府高级官员，再上去可做宰相了。他终于进入了统治集团的上层。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平淮西碑》以及大量的碑志等。

佛骨事件

宪宗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作为，领导了唐室的中兴，但却做着长生梦。刚做皇帝不久，他就问宰相，神仙之事是否可信。李藩引两句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回答。宪宗听了，点头称是，其实心中不以为然。淮西战事一结束，他就下诏天下，征求方士。有一个山人柳泌应征，自称能合长生药。宪宗很相信，派他去台州任刺史，就近在天台山采药。诏命一下，朝野震惊。谏官上书劝阻。宪宗说：“烦一州之力，为人主求长生，何惜一小州！”他这样表态，无人再说话。

佛骨事件也是宪宗长生梦的一部分。“好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神祠”，统治者每每既信道，又崇佛，企求双份的福祉。凤翔县的法门寺藏有一节佛骨，每三十年展览一次，据说能使“人安岁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派人迎出佛骨，进宫供奉，又送寺院公开展览，在长安引起轰动。

韩愈站在儒家立场，一贯反对虚妄玄幻，对宪宗这一举动，以及所引起的举国若狂的局面，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不能保持沉默，也顾不得个人的安危，给宪宗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他列举历史上